

周文华 著

现代汉语介词习得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系列

肖奚强 主编

现代汉语介词习得研究

周文华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介词习得研究/周文华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1. 11

ISBN 978-7-5100-3990-4

I. ①现… II. ①周… III. ①汉语—介词—研究—现代
IV. ① H14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210 号

现代汉语介词习得研究

著 者: 周文华

责任编辑: 陈晓辉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mm × 1245mm 1/24

印 张: 14.5

字 数: 325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3990-4/H · 1254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语言科技文库》总序

李葆嘉

当代语言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科学与技术的互补时代，信息处理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知识世界的载体是语符系统，信息处理的根本对象是语言信息处理。与计算机的出现使得语言符号有可能成为数据处理对象相似，神经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的应用，使得在大脑神经层面探讨语言机制成为可能。这些无疑都引导语言研究走向科技化，“语言科技新思维”（李葆嘉 2001）应运而生。所谓“语言科学”包括理论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分支学科，所谓“语言技术”指语言研究的现代技术手段，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音实验分析，以及语言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实验分析的技术手段等。就语言信息处理而言，又可以分为语料库研制技术、知识库研制技术、知识挖掘和抽取技术、句法信息处理技术、词汇信息处理技术、语音信息处理技术、语义信息处理技术、语用信息处理技术等。

2001 年 5 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创办了史无前例的“语言科学与技术系”，率先迈出了从传统文科教育范型向现代科技教育范型转变的步伐。“十五”期间，南京师大“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语言信息处理与分领域语言研究的现代化”（陈小荷教授主持），以基础平台建设、资源建设和理论探索等为主，迈出了语言科技研究的一大步。

“十一五”期间，南京师大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联袂申报“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该项目以“语言科技”为引导，以“多学科交叉、跨院系整合、开放型营运”为理念，建设具有前瞻性、原创性、成长性的语言科技高级工作平台。以典型课题的工作原理为核心，进行资源开发和系统研制，拓展语

音科技、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言语能力受损儿童的语言能力研究等新方向。同时造就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和培养一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以期形成一支高水平的交叉学科团队。该项目设计，体现了工作平台建设、理论创新、应用研究、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的学科发展一体化思路。其旨趣在于，加速语言研究从传统文科范型向现代科技范型的转变，以引领 21 世纪语言科技的新潮流。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项目，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匿名评审，“语言科技创新及工作平台建设”（2008 ~ 2011）获批，总投入 1000 万元。总体而言，这一“语言科技创新”团队，分支学科齐全，专业知识互补。涵盖了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义科技、语音科技、实验方言学、历史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二语习得研究、话语行为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期间，项目组成员获批的国家级基金项目达 20 多项。该项目理念之前瞻、实力之雄厚、工程之浩大、经费之保障，为学界瞩目。

2008 年秋，本项目以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为实施单位正式启动。主要有三大任务：建设一个领先性的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立一个独创性的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撰著一套有特色的语言科技文库。

从实验室方案设计到设备招标采购，再到实验室用房改造，经过 8 个月的努力，2009 年 12 月，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成，为语言研究从传统范型向科技范型的转变提供了基本保障。该实验室划分为实验工作区、科研工作区和管理服务区。实验工作区建有语音实验与计算室、神经认知实验与计算室、课堂话语实录室三个专门实验室。科研工作区建有语义科技工作室、语音科技工作室、方言实验工作室、知识工程工作室 I（先秦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 II（中古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 III（敦煌俗语言文字）、语言习得神经机制工作室、语言习得中介机制工作室，以及参研工作室。管理区服务包括办公室、管理室、编辑室和交流室。出席“语言科技高层论坛暨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落成仪式”（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专家认为，该实验室体现了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当代性和先进性，具有整体性、科技型、开放型三个特点，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语言科技新思维”的又一体现。同时认为，该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涵

盖了四个二级学科、四个博士学位点，有稳定明确的研究方向，有合理的设计规划和很好的科研基础；整体设计合理，功能齐备。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标准衡量，很多方面超过了指标。

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是基于工作原理（课题定位—理论方法—技术路线—关键技术—评估方式）而建设的高级平台。一方面，从语言信息、语言知识和语言机制三个层面，围绕典型课题进行设备配置、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一方面，将典型课题研究与工作平台建设融为一体，依据典型课题建设的子平台应具有解决同类课题的功能。

建设语言科技工作平台的目标是要实现语言研究手段的技术化和模型化，总体设计包括三个二级平台和八个子系统。

一、语言信息工作平台 1. 语义科技工作系统（李葆嘉教授主持）：基于词汇语义—句法语义的一体化研究思路，开发“人—机交互语义标注工具”，研制“深度语义标注信息库”；研制“幼儿（2~6）日常话语跟踪语料库”，完成幼儿语义系统和话语行为分析研究。2. 语音科技工作系统（顾文涛教授主持）：研制“多语言、多语境、多语用的语音语料库”，基于声学信号分析、感知实验和数学建模，完善语音韵律理论与相关技术应用。3. 方言实验工作系统（刘俐李教授主持）：完成“网络版汉语方言有声语料库”，拟定系统的可操作性语音、词汇、语法实验模型和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新兴交叉学科“实验方言学”。

二、语言知识工作平台 1. 先秦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陈小荷教授主持）：研制“先秦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先秦文献自动分词算法、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算法、同指专名检索软件工具等，完成“先秦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2. 中古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董志翘教授主持）：研制“中古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中古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中古文献自动分词和标注工具等，完成“中古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3. 敦煌俗语言文字统计与检索系统（黄征教授主持）：研制“敦煌文献资料库”、“敦煌文献俗词语档案库”，开发相应工具，完成“敦煌文献资料与知识检索”。

三、语言机制工作平台 1. 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系统（倪

传斌教授主持):研制“英语受蚀词汇库”等,基于行为学、脑成像和脑电三维度模型,进行中国人英语习得与磨蚀的神经机制研究,完成“基于神经机制的英语个性化学习分析系统”。2. 二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系统(肖奚强教授主持):研制“留学生汉语口语中介语语料库”,基于中介语理论、对比分析理论、偏误分析理论以及二语习得影响因素等,完成“留学生汉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

这一工作平台,既是科技研究平台,也是人才培养平台,即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体系。

作为本项目的文本成果,《语言科技文库》包括计算语言学研究、语义语法学研究、汉语方言学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新专题研究六个系列。其总体特征为:领域的开拓性、理论的原创性、选题的新颖性、方法的交叉性、考据的精审性、成果的应用性。在研究过程中,除了数据采集分析、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材料。陈小荷提出的先秦文献信息处理新方法,从先秦典籍注疏文献中挖掘出用于自动分词和词义消歧的知识,再注入已开发的古汉语分词和词性标注工具中去,所取得的前秦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先秦词汇知识自动挖掘等成果均具开拓性。李葆嘉提出的语义语法学理论和话语行为理论,基于研制专用语料库或语义信息库和技术手段,开拓了语义网络建构、深度语义分析和话语行为研究等新的领域。刘俐李建构的实验方言学理论和方法,为方言学向现代科技方法的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黄征多年来从事敦煌文献及其俗词语文字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系列中的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以及敦煌写本字词考释、以古佚和疑伪经为中心的敦煌佛典词语和俗字研究、两汉声母系统研究等新见迭出。肖奚强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二语习得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已经产生了影响。钱玉莲的汉语介词与相应英语形式比较研究等专著各有亮色。倪传斌依据语言测试和认知实验等数据,从行为学、生理学和语言学三个层面分析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外语磨蚀的相关因素。刘宇红基于隐喻的理论探讨,对各类隐喻形式的结构、特性和解读规律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入探讨。

《语言科技文库》所收论著,由作者在2008年12月申报选题,

2011 年始逐步完稿。系列主编审读了书稿，主要就其学术价值、章节安排、内容关联、行文表述、图表绘制等方面，提出审阅意见。此后，作者们对书稿又进行了修改和润色。《语言科技文库》的作者，大多数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对于我们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走进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而言，出版论著可能已不足为道。然而，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其论著的出版既是几年来研究的结晶，也是对其继续探索的促进。换言之，“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年轻教师搭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和教学平台。学科带头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携后进。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或学术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探索行为，然而复杂问题的研究，无疑需要群体协作。“学科建设”或团队合作模式，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这种模式涉及总体规划、多方协调，是需要付出精力和心血的。2008 年，通过投票方式推举我担任该项目总负责时，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劳动班委”。2009 年，前往安徽大学拜访黄德宽教授时，曾谈到“学科负责人的任务就是规划设计，争取项目经费和提供科研设备设施”，得到黄教授的赞许。2010 年，申报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评审专家柳士镇教授提问的“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项目，各学科之间的协调是怎么考虑的，有什么做法”，可谓一语中的。作为后学，深知交叉研究之艰、学科整合之难。相关学科之间的整合协调需要借助行政机制，但凭借行政方式并非就能完成。当时的回答是，目前做到的是建成了一个可以合作研究的场所，至于学科之间的进一步沟通合作应有较长过程。有一点很明确，只有通过交叉项目，相应学科才能渗透，合作者才能逐步磨合。我们只是在一步步探索。

十一五期间的“211 工程”建设项目即将完成，但是学科建设的任务并没有结束。2010 年，“语言信息科技研究中心”被评审为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语言科技”这一交叉领域注入了新的建设活力。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除了“跨院系整合、多学科交叉、开放型运行”理念，需要凸显“合作性攻关”。围绕交叉性项目，实施计算语言学、语音科技、神经语言学、语义科技等力量的联合攻关计划。只有通过全面开放以及和与国内外同

行的合作交流，才有望建成具有影响的语言科技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基地。

十年前，我（2001）曾写道：“语言科技”的内涵是以理论研究为指导，以描写研究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枢纽，促使语言研究向计算机应用、认知科学和现代教育技术领域等延伸，沟通文理工相关学科以实现语言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技术化。“语言科技”的外延为语言工程科技、语言教育科技和语言研究科技。其中，“语言研究科技”是将语言研究活动与资源建设、软件开发相结合，其目标是实现语言学自身的科技化。还应包含语言实验、数据处理这些实验语音学、神经语言学研究的科技手段。

虽然语言学家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转向语言计算或实验研究，尽管描写、考据和内省始终是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具有一定的语言科技意识却非常必要。语言学家只有了解有哪些可供利用的资源、软件或仪器，才能提高其研究深度、精度和效率。语言学家也只有了解到信息处理的语言研究需求，才有可能为之提供可资应用或参考的基础成果。“语言科技”是 21 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潮流。

此为出版缘起。是为总序。

2011 年 8 月谨识于南都

肖 序

自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学者塞林格 (Selinker) 指出中介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 具有自身的系统性以来, 很多学者都致力于中介语的研究。但迄今为止, 国内外除了对少量的语素、部分语音、词汇和语法作过偏误分析或中介语状况研究以外, 尚未有人对一定数量的语料进行穷尽性的统计分析, 以全面描述、解释中介语的语音、词汇或语法方面的系统性。所以时至今日中介语的系统性仍然是一种假设而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并应该持续性研究的课题。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在国内已二十多年的历史, 其研究方法也从内省型 (主要指学习策略研究)、零散举例型向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实证型转变。建立较大规模的中介语语料库,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国别的学习者习得状况的考察是中介语研究的总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 全面地统计分析各学习阶段的中介语中各个语言要素的状况, 描写、解释不同语言的中介语系统, 检验完善中介语理论, 为语言教学与测试提供参考是本学科前沿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周文华博士的这部专著在检验、完善中介语的系统性和中介语研究理论方面做了一项非常有益的基础工作。这是国内第一部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现代汉语介词系统习得研究专著, 从研究的理论依据、方法到研究手段, 都有着比较鲜明的特点。

第一, 全书的理论基础扎实, 自始至终围绕着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 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的偏误分析理论、中介语理论、习得顺序假说、输入与输出假说展开教学语法和外国学生习得状况的研究。

第二, 全书的研究系统性较强。首先是研究内容系统, 全书研究了整个现代汉语介词系统所有的介词及其义项的教学语法和中介语状况。其次是研究对象全面, 全书的研究对象包括初、中、高三

个学习阶段的外国学生所产生的汉语中介语，这也保证了中介语考察的系统性。

第三，顺应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依据的语料来源十分丰富，不仅有较大规模的中介语语料库，相应规模的汉语母语者语料库，还有三个年级对外汉语教材的课文语料库。这些语料库为本书的习得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数据支持。

第四，中介语的考察思路清晰，方法得当。当下，考察中介语的习得顺序多采用使用频率、正确率、偏误率、正确使用相对频率、习得区间等标准，有的研究使用单一标准，有的研究使用多个标准，所得结论往往互有出入。本书的研究立足于中介语的动态考察，首先使用初现率的标准找到各介词出现的学习阶段，然后通过使用频率和正确率的结合考察，得出外国学生各介词的难度等级，参照汉语母语者的使用频率调整介词的习得顺序。

第五，应用价值较高。无论是在教学语法方面，还是外国学生习得状况方面，本书都有一些有价值的发现。比如，大部分近义介词的互换有很多限制条件，尤其是一些汉语母语者习焉不察的限制条件，往往是外国学生学习的难点。通过本书的梳理，理清了很多近义介词的互换规律，这对于教学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不同类介词的使用规律不同，它们的难度也就有所不同，本书的考察找出了不同类别介词的难度等级，为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书是基于普遍语法的中介语研究，虽然大部分语法项目在各种语言中存在普遍规律，不同国别的学生在习得时存在普遍规律，但其中也必定会有一些语法项目是存在国别差异的，如果能够在本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分国别的汉语介词习得研究，也许可以弥补本书的缺憾。

周文华博士自2004年跟我读硕以来，已经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默默耕耘了六七个头。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我所主持的江苏省哲社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1工程二期、三期项目的研究工作，为这些项目的圆满完成贡献了他的勤劳和智慧。他是我们团队中最为勤勉、最有定力、最具组织协调能力的一个。他在短

短几年内就站在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前沿，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并为学界奉献出这部高质量的专著。我相信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勤奋精神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周文华博士一定能够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和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方面取得更加突出的成绩。

肖翼强

2011-7-13 于随园

前言

一、缘起

首先，作为相对封闭的虚词类的现代汉语介词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句法中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用错了一个实词，通常只限于实词本身；而用错了一个虚词，则往往会影响整个组合的关系或全句语气，它的使用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徐枢，1997）一直以来，介词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介词进行了分类和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但这些成果如何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却很少有学者探讨。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现代汉语介词的教学语法研究远不如本体语法研究得那么深入、详细。对外汉语教师缺乏可以直接运用到教学中的现代汉语介词研究成果。

其次，纵观对外汉语界关于现代汉语介词的习得研究，成果只集中在少数介词，而对大多数的介词缺乏研究。因此，现代汉语介词的习得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另外，学界在介词的偏误分析方面开展的研究比较多，以中介语语料为依托的介词习得研究却很少。这样就很难了解外国学生习得现代汉语介词的全貌。因此，基于一定中介语语料的现代汉语介词习得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第三，对外汉语教学大纲和教材关于现代汉语介词的设置有待商榷^①：首先，三套权威对外汉语教材和考试大纲共同收录的介词只有“把、被、比、朝、从、当、对、给、跟、和、叫、往、向、在、按、趁、将、就、距离、顺、随、沿、以、由、由于、于、与、自、自从、打”等30个。而且，它们在三套大纲中的等级分布也不平衡。那么，这30个介词是否是日常交际中需求量最高的、学生最需

^① 具体数据请见附录。

要掌握的？它们的分级排序顺序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都缺乏实证性研究。其次，从选取的三套一、二、三年级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表的介词收录情况来看，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表中的介词数量少于大纲，而且各级教材中都有一些重复的介词设置。这说明编者对介词的选取和编排顺序有不同的意见，而这些不一致的编排显然不利于教学。需要通过系统研究找到一个合理的分类与排序标准，为大纲的制定和教材的编写提供借鉴。

基于以上三点，本书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中介语中的现代汉语介词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以发现现代汉语介词的习得顺序及习得过程中的偏误规律，为大纲的制定、教材的编写和课堂教学提供参考。

二、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一）研究内容

本书的研究包括以下内容：

1. 介词的分类

学界对于介词的分类有很多观点，从教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按照刘月华等（2001）的分类标准，把现代汉语介词分为“时间介词、空间介词、对象介词、依据介词、缘由介词”五类，并分别在不同章节中加以讨论。

2. 各类介词的数量及句法功能考察

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语料考察的结果，确定每类介词中的具体介词。然后结合语料例证，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分析归纳各介词的句法规则，以及近义介词之间的互换规则。

3. 介词的习得考察

通过对分级的中介语语料的考察，利用使用频率、初现率、正确率等标准分析各类介词（包括同一个介词的不同用法）的难度等级和习得顺序，同时考察外国学生习得过程中的偏误及其形成原因。

4. 教学建议

最后，反观大纲和教材的编排顺序，根据以上习得考察的结果对不同介词的教学编排提出建议。

（二）研究方法^①

本书将主要采取以下四种研究方法：

1. 语料库的研究方法

本书利用汉语母语者语料库、中介语语料库和对外汉语教材语料库三种语料库，考察不同介词的使用情况。并着重对中介语语料库中现代汉语介词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考察，揭示其习得难度和习得顺序。

2. 统计与数据分析的方法

这是处理语料时所运用的最基本的方法。主要包括对汉语母语者语料、中介语语料、对外汉语教材语料中各介词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对中介语语料中正确用例和偏误用例在各学时等级上的出现情况进行统计，对各类偏误类型进行统计等。

3. 比较法

这也是本书所运用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主要包括外国学生使用情况和汉语母语者使用情况之间的比较；初、中、高三级学生各介词的使用情况的比较；外国学生实际的习得顺序与大纲和教材中排序的比较；外国学生使用情况和教材输入情况的比较。

4. 描写、分析和解释相结合的方法

这一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描写、分析、解释外国学生习得各类介词的中介语系统。主要包括根据不同的偏误类型来分析各类偏误的分布和变化情况，并对偏误（或回避）的原因作出一定的解释；描述习得过程并对其中出现的现象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解释；探讨习得顺序并对习得顺序的成因进行一定的解释。

（三）技术路线

本书对教学语法中的介词的学习难度与分级排序研究是循着以下的技术路线展开的：

1. 根据以往的研究和语料考察确立各类介词的具体数量，梳理汉语介词的相关使用规则。

2. 对一定数量的分级的中介语语料进行统计，分析对比各级中

^①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主要是在肖奚强（2005）、肖奚强等（2008，2009）的基础上展开的。

的正误用例的比例，得出一定的习得难度和顺序。

3. 统计一定数量的汉语母语者语料并对比分析中介语的使用情况与汉语母语者的使用情况。此条的加入目的在于了解学生对该语言点是使用过量还是使用不足，特别是借此发现学生的回避现象，以此修正第2条所得之习得难度的偏差。同时，我们还要统计初、中、高各级教材的输入情况并与中介语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教学输入与中介语输出的差异。

中介语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了解第二语言的习得状况和规律，而且还应该为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因此，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做了第四项工作：

4. 反观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排是否与习得状况相一致，进而提出教学的分级和排序建议。

三、理论背景和相关术语界定

（一）理论背景

本书主要是以现代汉语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为指导，对汉语介词进行学习难度和分级排序研究。

1. 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

本书对介词的选取、语义分类和句法分析首先是建立在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基础之上的。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梳理、借鉴、吸收和修正汉语本体的研究成果，以确定所研究的介词的性质、范围和分类，并归纳其语法、语义和语用特征。

2.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本书在选取介词、分析学习难度和研究分级排序时，同时依据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主要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的偏误分析与中介语理论、“内在大纲”与习得顺序理论等。

偏误分析理论认为学生的语言偏误是观察学生二语习得状况的一个“窗口”。而中介语理论则认为学生所产生的中介语既包括正确部分（符合目的语语法的部分），也包括偏误部分（不符合目的语语法的部分），中介语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习得状况。习得理论认为习得者有大致相同的“内在大纲”和习得顺序，该顺序不受母语背景、性别、第二语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Ellis (1994) 还指出，

如果教学顺序与学生的“内在大纲”相一致，会促进学生的习得，从而加快学生的习得速度。本书综合运用上述理论展开研究。

（二）相关术语界定

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术语主要有“习得顺序”、“习得难度”、“初现率”和“习得标准”。以下对这四个术语作出界定。

1. 习得顺序

习得顺序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某一语法项目掌握的先后顺序，这一顺序体现第二语言习得的内在发展规律。习得顺序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实际语言项目的习得顺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序列，而是以区间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同一区间内的语言项目的习得顺序可能会因某种原因而有所变化，这就体现出一种习得等级。同一习得等级内的语言项目难度相当，差不多在同一阶段习得。二语学习者按照习得等级，由低到高地习得，其发展过程不可改变。由此可见，“习得等级”是对“习得顺序”进行的再抽象，是“习得顺序”所允许的变化和调整范围。

2. 习得难度

习得难度是指学习者掌握某一语法项目的难易程度。习得顺序与习得难度有密切的关联：一般习得难度低的项目先习得，习得难度高的项目后习得。与习得顺序一样，习得难度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序列，而是以区间的形式体现出一种难度等级。同一难度等级内的语言项目难度差别不大。“难度等级”与“习得等级”有很高的相关性。

3. 初现率

“初现率标准”是以某一个语言项目在中介语中第一次“有系统”的和非“公式化”的出现和使用作为参数来确定这个语言项目习得过程的开始（Meisel, Clahsen and Pienemann, 1981; Pienemann, 1984; Larsen-Freeman & Long, 1991）。^① 其操作标准一般为非“公式化”的语言项目出现3例以上。初现率标准作为一种习得衡量标准，不是为了发现某个语法结构什么时候习得成功，而是旨在确定习得的起始（Pienemann, 1984, 1998）。达到初现率标准的

^① 转引自张燕吟（2003）。